

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业考试的特点及启示

张亚群 冯 寅

摘要:上海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早期大学之一,其学业考试具有鲜明特色,促进了精英人才的培养。该校以培育通才为目标,学业考试范围覆盖教学全程,考试方式灵活多样,成绩评定严明有序,并增设补考环节,形成了一套科学、规范的学业考试评价体系。深入探究其学业考试的方法,总结其经验,对于当今高校学业考试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业考试;特点;启示

DOI:10.16391/j.cnki.jyks.2018.01.008

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系统完整、组织严密、方式灵活的学业考试制度。上海圣约翰大学源于1879年美国传教士施约瑟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区注册正式成为大学,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被合并,办学历程达73年之久。圣约翰大学作为美国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早期大学之一,其移植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建立了科学、规范、严格的学业考试制度,促进了精英人才的培养。探究圣约翰大学学业考试特点与经验,对于当代高校学业考试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从书院到大学:圣约翰大学学业考试制度的建立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的产物,它是在教会中等学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19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西方传教士利用对华不平等条约,开始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兴办学校、教堂、医院等文化设施。早期教会学校的初创者多是西方传教士。

他们根据本国教育经验,以西方学校教学制度、课程体系为参照,兴办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机构。其在华办学活动随着社会变迁和人才培养需要而逐步升级,保持欧美学校教育的特点。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创建之初,“其课程与生活,仿照泰西传习的制度规定。”^[1]圣约翰大学的起源、发展及其办学活动亦是如此。

1879年,美国圣公会中国布道区主教施约瑟在上海创办圣约翰书院(Saint John's College)。之所以称为“书院”,是因为它规模较小,创办之初只有学生39人;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在名称上与中国教育传统“接轨”,与遍布中国各地的书院教育机构相协调。施约瑟是著名的翻译家,曾将《圣经》重译为浅显的中文,但是,其本人并未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加之主教事务繁忙,很少有时间直接过问具体的办学事宜,因此,圣约翰书院初期的办学活动,主要由华人牧师颜永京协助。颜永京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建阳学院(Kenyon College),这是一所典型的美国教派支持的文理学院。颜永京在协助办学过程中,依据其母校的办学模式,引进以人文教

作者简介:张亚群,男,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厦门 361005);冯寅,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厦门 361005)

育为主的课程体系,增设英语教学,由此奠定了圣约翰大学教育的学科与课程基础。

1888年,卜舫济出任圣约翰书院监院。他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自由教育理念及办学模式颇为推崇,立志要把圣约翰书院建成一所“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成为培养具有宗教信仰的领袖人物的摇篮。^[2]为此,卜舫济引导圣约翰书院从小型教派学院发展成为一所现代综合性大学。在学业考试方面,圣约翰书院经历了从考核宽松到严格评定的过程。

初创时期,该校主要关注生源数量,在学业考试制度建设及实施方面并不完备。1879年9月1日,在开学典礼上,施约瑟表示入校学生完全免费,“衣服饮食书籍文具,悉由学校供给”,学生则要保证在宗教生活和用功习惯方面有优异表现。^[3]与早期成立的教会教育机构相似,圣约翰书院办学的最初目的在培养基督信徒,课程教学则居其次。卜舫济就任书院监督后,开始制定严格的学业成绩标准,改革纪律散漫的教学。第一个学期就取消了11名学生学籍,其中3人因资质平庸被退学,8人因行为不端而被开除。^[4]

1892年,圣约翰书院成立相当于大学教育性质的三年制正馆,与相当于中学或大学预科的四年制备馆共同组成完整学制。“凡备馆四年毕业者,如在正馆续学三年,可以免费。”^[5]1896年圣约翰书院改组并扩建为圣约翰学校,成立由文理、医学和神学三科组成的大学部。1904年三年制文理科改为四年制。在学业考试方面,规定考试范围与内容由任课教师先行准备,经与校长商讨后方可实行;毕业生是否能够获得文凭,由教师委员会投票决定。^[6]

1905年,在卜舫济校长的推动和策划下,圣约翰书院在美国注册,正式取得大学地位,次年,正式更名为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以此为转折点,这所教会大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办学层次上,圣约翰大学分设预科和本科,而以本科为主。后来将预科归为附属中学。在学科建制上,圣约翰大学开始设文、理、医、神四科,以文理科为主体。

从书院发展为综合性大学,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学校课程体系逐渐扩大。1909年圣约翰大学西学斋课程结构为:文科课程包含历史类6门、文学类3门、语

言学类3门、社会学类2门、教育学和理财学各1门、哲学类2门、宗教类4门;理科包含格致科7门、算学科7门、物理学1门等,另有艺术类的图画课。^[7]在教学上,全面实行英文授课;课程体系以人文经典、自然科学为主;实施以学分升级制为基础的学业评价制度,学业考试体系逐步完备成熟。

二、圣约翰大学学业考试的特点

卜舫济长期主持圣约翰书院(大学)校务,对圣约翰书院(大学)办学目标、教学与学业评价制度、学生管理产生深远影响。他以培养通才为目标,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学业考试方面,圣约翰大学具有以下特点。

(一)办学者秉持自由教育的理念,重视文理基础教学与考核,为培养通才服务

圣约翰大学的各项办学活动贯彻自由教育理念。早在1894年,卜舫济确定圣约翰校训“光与真理”时,就倡导自由教育理念。他在校刊《约翰声》中评论:“美国有古大学图书馆,大书希伯来文,光与真理(Light and Truth)一语,本校即以是校训……最高学府之目的,似无有再较此高尚者矣。本校之宗旨,在使学生有广博之自由教育,先使学生对于英文文学,有彻底之研究,然后授以科学,使之明了真理以增进人类之幸福,而尤要者,则在于养成学生之优良品格。”^[8]因此,从圣约翰书院到圣约翰大学,卜舫济一贯重视文理学科教学,培养学生的高尚品格与宽广兴趣。

在办学实践中,卜舫济强调应致力于让学生“熟悉历史,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以达到“心目中的宇宙愈广,而其生命愈大”的人生意义。^[9]在自由教育理念引导下,圣约翰大学的学业考试制度体系严密、等级分明,以此检验教学质量,又具备一定弹性,给予学生更为自由的学习空间。卜舫济主张,德育重于智育,在考试方式上,将训练学生品行与考察学术相结合。

(二)学业考试范围覆盖全体大学课程,考核学生全程学习情况

圣约翰大学课程数量逐年增加。据统计,1919年文、理、道三科系共有课程123门,其中文科69门、理科28门、道科26门。^[10]1934年共有课程284门,其中文学类课程126门,含国学、英文学、宗教学、经济学、教育学各科,理工类73门,含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

学各科,医学类40门、神学类25门。^[11]随着圣约翰大学课程数量增多,学业考试范围也增大,考核覆盖了大学文理各科、所有课程。全校共同必修课程如英文、国文、体育以及各院主系课程、辅系课程、自由选修课程,均设学业考核评价。

除学术训练外,圣约翰大学相当重视学生身体素质训练,体现在学业考试上则包括了体育考试。该校是最早引入西方近代体育活动的大学。军事操一直是圣约翰大学的必修课程。1921年起圣约翰大学实行所有学生二年强制运动制度,并要求低年级学生每年必须体检两次,根据体检结果安排学生从事其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同时负责给新生做身体检查的人员就是本校医学院学生,^[12]相当于医学生又多了一次实践的教学机会。圣约翰大学体育教育发达在民国大学中首屈一指,这与其提倡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将体育作为必修课程与考核项目息息相关。林语堂感叹道:“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13]

圣约翰大学学业考试不仅包含全体课程,还全程关注学生学习,考核每一阶段的学习情况。因此,与课程考核对应的是课程学分和学年升级。学校以28学分、68学分、100学分各作为一年级升二年级、二年级升三年级、三年级升四年级的硬性指标,其中每一级学分标准又各有规定。^[14]总体原则是:及格课程数量越少,该学期学分越低,下一学期可选课程则越受限。学分升级制将测试考验、课程、学分、升班(级)与教学质量、学生学习成绩构成一个全面的学业评价体系。学生学习能力不足以达到一般学程标准时,将限制其学程学分数量,以便集中精力学习基础课程,补足基本知识储备(通过补考检验)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可见,圣约翰学业考试作为学分与学年连接环节,将学生的阶段学习水平纳入考核体系,有利于实施考试的检测与分流功能。

(三)教师享有教学自主权,考试方式不拘一格

圣约翰大学有其基本、常规的考试方式。一门课程的具体考试包括“课间小考(随堂测试)、月考、大考(学期考验)”三类,规定为“每学期举行月考二次,学期考验一次。每次均以成绩报告家长”。^[15]大考最为

重要,月考是教师为学生期末打分的参考依据,课间小考一般用以考察学生的预习情况。^[16]基础的考核方式为笔试,但授课教师拥有很高的教学自主权,可根据课程特点自行设置考核方式。例如圣约翰医学院讲授神经病学的大海彭教授(Dr. Halpern),其授课从来不用讲稿,全凭记忆,考试时全部口试。被考的学生坐在她对面,其他学生可以坐在旁边听。当她提出考题时如能顺利地回答前一部分,她立即叫停,并转向第二个考题,问过两个考题后即评分。^[17]此种考试方式除有利于检验学生知识基础是否扎实外,还可以锻炼学生的集中力与应变能力——这两种能力对医学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该校还提倡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商议后,实施无人监考制度。名誉考验制(honor system)就是圣约翰大学一大特色考试,即无人监考的考试制度,考核学生学习情况同时考察学生诚信品格。在学生升入高年级后,学校会通知学生有权选择是否实施名誉考验。经授课教师允许、全班学生达成一致后即可施行。苏公隽形容名誉制考试情形为:“教授分发题纸后,即便引去,同学们在课室中鸦雀无声,振笔疾书,既不交头接耳,又不剽窃夹带,考毕将试卷缴在教授桌上,由最后一人汇总送去。在考试的中途,倘有需要,尽可自由出入。”^[18]当然,无人监考是对学生品行的考验和信任,并不代表圣约翰大学考试有机可趁,学生作弊一经发觉必然开除学籍,绝无通融可言。

由名人监考的特别英语考试是圣约翰大学学业考试的另一创新。1917学年开始,圣约翰大学文理两科学生,如果在毕业时希望获得学士学位,就必须参加在上级或高级时举行的特邀名人监试的特别英文口试和笔试,并且必须取得“优美之课绩”。否则不给学位。该特别测试不仅体现圣约翰大学重视学生英文水平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传达出一种先进、现代的教育理念:毕业不等于获得学位,获得学位的要求应该高于毕业的要求。^[19]通过在特邀名人面前进行笔试、口试的测验方式,从听、说、读、写尤其口头表达和个人风貌上考察学生是否称得上“学士”称谓。此考试是对毕业生更加严格的要求,也体现圣约翰对“学士”学位的理解与重视——学士应是社会中的精英贵族,是具有各方面能力的“完整的人”。

(四) 设置等级分明的成绩评价标准, 严格把关人才培养质量

圣约翰大学参照美国大学成绩等级制度, 基本稳定使用六等记分制。六等记分制“以百分至九十五分为超等, 九十分至九十四分为甲等, 八十分至八十九分为乙等, 七十分至七十九分为丙等, 六十分至六十九分为丁等, 无分至五十九分为戊等。超甲乙丙丁五等为及格; 丁等得学分三分之二; 戊等不予学分, 欲得学分, 必须重习。”^[20] 圣约翰大学成绩体系中的超等、甲等、乙等、丙等、丁等、戊等六级有其对应具体分数标准, 每门课程低于 70 分无法拿到全部学分, 低于 60 分必须重修。此外在不及格课程数量上也有标准: 一个完整学期的所有课程修完, 其所得课程学分有半数或半数以上不及格者(丁等、戊等), 教务主任需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判断学生是否应受到停学处分; 对于全学年所修课程学分有半数或半数以上不及格的学生, 圣约翰则是毫无犹豫作出停学处分, 不可谓不严厉。等级严明的成绩评价体系起到了学生筛选与分流作用, 在高等教育资源极为缺少的精英教育阶段能够保障整体的教育效率。

(五) 增设考试环节, 以补考添加教育评价的弹性

补考是学期考试的重要补充环节。圣约翰大学允许学生带着一定(限制类别和数量)的不合格课程升入下一年级, 但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补考并通过。1917 年前圣约翰大学学业考试规定对学生不及格课程一般给予两次补考机会, 第一次补考所允许的不合格课程在一到两门或者可到三门, 第二次补考不合格课程不得多于一门。^[21] 按此计算, 学生大学期间最多可获得四门课程补考机会, 并不限课程类别, 这种做法有利于学习基础薄弱的学生, 但也存在学生利用多次补考机会松懈学习的隐忧。随国人自办大学教育优势逐渐凸显, 过于宽泛的补考机制不利于圣约翰大学在日益激烈的办学竞争中培养一流人才、领袖人物。1917 年开始, 圣约翰大学补考规定进一步严格, 对不合格课程种类做出限制: 规定周课时 6 小时的课程成绩在末等者, 不得参加补考。1918 年起, 学生能获得的补考机会减少到一次, 并且限制条件继续增加: 周课时 12 小时的课程不及格不得补考(实验课时折半计算); 补考后仍有周课时在 7 小时之课程未能及格者, 不得升班; 补考

有效时间限制在升入高年级之学年内, 否则下一学年不准升班。升级考试成绩在戊等者, 不准补考, 只能重修。^[22] 圣约翰增设的补考环节一方面为学生考虑, 给予其学业考试第二次机会; 另一方面补考制度上也逐渐严格, 减少学生利用补考而平日勤勉不足。

对于非成绩不足而需要补考的例外情况, 圣约翰大学处理方式也非常灵活。《圣约翰一览》规定: “凡学生因事未经学期考验, 而具有充分理由者, 由教务主任允准, 得补行考验。未考验前, 教员不计分; 考验后不及格者, 即作不及格论。凡不计分者, 最好于下一学期第 16 周内补毕, 至迟不得过一年; 过一年者, 亦作不及格论”^[23] 由此可见, 圣约翰大学学业考试制度虽整体严格, 但其细节实施极富人性化, 全面考虑学生各种情况, 以客观、包容的学业评价方式, 达到检测学生学习成果的目的。

三、圣约翰大学学业考试的历史启示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一所著名教会大学,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经历了从开拓者到追随者与补充者的角色转换。通过培养的近万名学生以及“圣约翰教育圈”, 这所大学对中国社会尤其上海地区教育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24] 圣约翰大学率先移植西方教育体制, 在国人自办大学尚未成型之际, 较早实施高等教育活动, 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从书院到大学, 圣约翰大学发展了一套较为健全的现代学业考试制度。在教学方面实行学分升级制, 逐步完善学位授予制, 与学业考试相配合, 培养了一批高层次、高素质、颇具社会影响力的精英人才。“圣约翰模式”不仅为近代中国大学提供了借鉴, 其历史经验对于当今高校学业考试改革和人才培养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构建全程学业考试体系, 发挥考试的学习导向功能

学业考试具有引导学习、诊断教学、激励学习等多种功能, 是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一环。圣约翰大学围绕培养目标, 实施各项学业考试, 促进了学生的发展。卜舛济从不赞成机械学习, 提出使学生获得广博的自由教育。^[25] 为避免学生因应付考试而无效学习, 圣约翰大学构建了以学期为单位、贯穿本科教育全程的学业考试体系, 保障人才培养活动有序进行。各学期学业评估情况与下学期课程进度相衔接, 以满足不

同学习程度的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每一学期内,以随堂考、月考、期末考相结合的方式,督促学生注重平时学习与思考,养成即时消化知识的习惯,便于授课教师掌握学生情况、因材施教;因平时成绩有迹可寻,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期末考试一锤定音、使考试沦为教师打压学生的“利器”或蜕变为学期成绩高低的“调节剂”^[26]。

当今国内高校学业考试在学习导向上存在薄弱环节,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平日松懈、临考突击应付的问题,这种状况不利于人才培养。因此,应强化学业考试的引导功能,构建全程式学业考试体系,关注学生平时成绩评价与个体需求差异,促进大学生主动学习,更好地发展。

(二) 严格高校学业考试管理,发挥考试的保障和激励功能

学业考试作为评价学习成绩的基本手段,对于保障和提升专门人才的培养质量至关重要。在学业考试的规范性方面,圣约翰大学相当重视教学制度制定,其大学章程涵盖了人才培养各环节的管理细则,并以条目形式呈现,使得教育活动从设计到实施均有据可查、有“法”可依。在学业考试方面,圣约翰大学坚定奉行严格主义。据1938年9月圣约翰注册处统计,该年文理学院各年级的课程不及格率分别为一年级40%,二年级30%,三年级12%,四年级14%;土木工程学院各年级课程不及格率分别为一年级31%,二年级24%,三年级43%,四年级6%。^[27]被圣约翰考试淘汰的学生不在少数,而高质量的毕业生却为圣约翰赢得更多声誉。可见,从严实施学业考试,可有效发挥其诊断、分流、促学的功能。此外,树立严肃的学风考纪,本身亦是人格教育的重要环节,对学生的品行、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实行规范、严格的学业考试是完善教学管理、激励学生学习的必要保障。受教育管理、学习环境等因素影响,当今高校学业考试制度和考试环境建设有待加强。学业考试管理不规范、非学术因素导致成绩异动等现象,导致不能发挥考试的测量与激励功能。目前,国内高校大多制定了大学章程,应树立依法治校的理念,进一步完善、细化学业考试相关规章制度,从学生到教师、从考试制定到成绩评定均责权分明。

(三) 教学管理与学业考试相互配合,合力提升教学质量

学业考试是高校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学业成绩的考查与评定是检测教学效果,对教学过程进行调节控制,掌握教学平衡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28]圣约翰大学将学业考试与教学管理制度相配合,形成人才培养的合力。例如,把学生招生考试制度与学分升级制、学位授予制紧密结合,每学期学分总量与能否升级对应,每门课程学分量与考试成绩等级对应,以学业考试判断学生个体发展是否达到教学目标,并据此调节学生学习进度及教学活动整体,从而保证高校教学质量。

上述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学业考试不是教育目的,但却是实现大学教育目标的有效手段。学业考试本应在教学环节中发挥诊断、激励的作用,将教学管理与考试合为一体,可推动教学改革,有效提高教学质量。此外,补考也是全程式学业考试的组成部分,能够有效督促学生弥补某门课程学习深度与广度的不足、夯实知识基础,在高校学业考试中也应得到应有的重视。

(四) 实行多元学业考试形式,促进学生灵活学习、多样化发展

应试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中长期存在又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以改革高校学业考试为契机,以多元考试形式推动学生多种能力协同发展,是发展素质教育的一个突破口。在这一方面,圣约翰大学学业考试经验值得借鉴。

如前所述,圣约翰大学的学业考试从不拘于单一形式,而是施行以笔试为基础,配合“笔试加口试”“口试”等考试类型,充分体现考试的教育测量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大学形成了教授治学的优良传统,教师对其所授课程拥有相当大的教学自主权,可自行决定考试形式,经校长或系主任同意后即可施行。此外,圣约翰大学还引进西方大学的身体测试、“名誉制”“名人测验”等测验方式,考察学生的身体素质、道德品行乃至个人魅力与临场发挥能力。在圣约翰大学,学生即便深刻理解了课堂教学内容,如果不具备广博的能力,也不一定可在所有考试中均表现良好。总之,以多元的考试测量形式考察和检测大学生学习的多种能

力,促进其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是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共同路径。

参考文献:

[1] 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137.

[2]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95.

[3][4][5][9][17][24][27] 徐以骅主编.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9,13,17,82,337-338,132,134.

[6][7][8][10][11][12][14][15][16][19][20][21][22][23]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4,88,418,96,147-149,296,440-441,441,277-278,81,441,77,77,441-442.

[13] 林语堂.人生当如是[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13.

[18] 苏公隽.圣约翰大学面面观[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辑存(第3辑)[C].常熟:政协常熟市文史资料委员会,1962.149-150.

[25] 张亚群.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196.

[26] 党亭军.注重平时与从严治考 民国时期大学学业考试管理制度研究[J].江苏高教,2013(1):89-91.

[28] 田建荣.学业成绩考试:高校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15-18.

(责任编辑:郑芳)

(上接第47页)

是科宴规模、等级与次数都远高于明初,以致在万历至崇祯走向了奢侈消费发展阶段,达到“浮糜”程度,加速了社会负担,成为明末爆发全面经济、社会与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

科举学是门内容广博的专学,虽然研究对象专门,但是内容广博。以本次研讨会为例,可以看到一地区之政治、社会、文化、族群、家族、个人,从宏观到微观,都与科举制度息息相关。换句话说,这些主题研究若忽视对科举制度的考察,可能失于片面;而当我们将这些主题与科举制度挂钩上后,也可以反过来丰富科

举学的研究。对于台湾研究,更因为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作为闽台之间有形和无形的联系纽带,而能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到其中所具有特殊意义与启发价值。总之,随着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参与,使得科举学有着多视角的研究,在互相激荡与切磋琢磨下,更能得到灵感与启发。本次会议促进了两岸的交流和科举学研究,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会议。

(责任编辑:王伟宜)